

《青琐高议》版本源流考

李 小 龙

《青琐高议》是宋代传奇小说集,在小说发展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该书流传至今的版本有近十种,互有歧异,亦有渊源,笔者查检了这些版本,草成此文,求正于方家。

一、成书时间与宋本面貌

宋人高承《事物纪原》卷十云“熙宁中刘斧撰《青琐集》”^①,据此可知《青琐高议》的成书当在熙宁(1068-1077)年间。又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云高承为“元丰中人”^②,与熙宁仅数年之隔,故高承此言当可信。

当然这里所说的是《青琐高议》的最后完成,因为在孙副枢给《青琐高议》所作的序中已经说“刘斧秀才者,自京来杭谒余。吐论明白,有足称道。复出异事之数百篇,予爱其文,求余为序。”^③可知孙氏为序时其书已积有数百篇,虽为约数,但可以肯定已初具规模了(现存全本《青琐高议》总共才一百四十二条,加上补遗不过二百条)。而据李剑国先生考论,此孙副枢即为孙沔,其以资政殿大学士知杭日,在至和年间(1054-1056)^④,可见其成书过程持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不过,这个时间的下限在什么时候呢,薛洪勤云:“其后集卷二《直笔》条谓范纯仁后为丞相,事在元祐三年(1088),成书当在其后。”^⑤而欧阳健因其后集称王安石为“荆公”,称司马光为“温公”,也认为当成于此二人逝世的1086年之后^⑥。李剑国先生亦因“司马温公”的称呼定其成书为哲宗元

①(宋)高承:《事物纪原》,中华书局,1989年,第541页。

②(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10页。

③按:凡引刘斧《青琐高议》原文,除注出者外均据惠栋所藏明抄本。

④李剑国:《宋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82-183页。以下引李剑国说如不特别说明均出自此书“青琐高议”条叙录,不另注。

⑤见《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青琐高议”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396页。

⑥欧阳健:《青琐高议》,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4页。

祐间,当然,他还发现“后集卷二《时邦美》记事到大观初,已去至和末《青琐高议》初成时五十多年”,故疑其“似不属本书文字”。其实,以上所言的论据也许都不能成立,因为所举的这几篇均为明人重编时增入,并不能作为成书的依据(详后)。所以,其成书还当以熙宁年间为妥。

此书成书后便当有刊本流传了,因为在宋代,《郡斋读书志》、《通志·艺文略》和《遂初堂书目》均著录了此书^①;而《铁围山丛谈》、《宾退录》、《夷坚志》、《云麓漫钞》甚至南宋施宿注东坡诗时均提到它^②;还有《诗话总龟》前集、《苕溪渔隐丛话》、《竹庄诗话》以及《类说》、《紺珠集》、《绿窗新话》等大量的宋代笔记、小说、诗话、地志均摘录了此书的篇目(详见下文)。

然而,宋刊本现已不传。据《郡斋读书志》、《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与《文献通考》著录,此书宋本应当为十八卷,又《诗话总龟》与《竹庄诗话》均同时引有《青琐集》与《青琐后集》,加之今本后集卷一《议医》条云“前集尝言之矣”,知原书十八卷当分为前后两集,而现存版本除张梦锡本外均分为前后集各十卷^③,又有一部分本子另有别集七卷^④,可见当已经过后人重编。

二、明人重编的“新增本”

李剑国叙录认为“今本二十七卷绝不是在原书十八卷基础上又有所增益,而是重编本,可能是南宋书坊所为”。其实当非如此,从现有资料来看,其重编应在明代,而且,当有一定增益。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著录为“新增京本青琐高议”的明抄本(我们称之为“新增本”)便是一个有力证明。此本只存前集卷一至五,后集卷一至八,共十三卷,但它却揭示了许多问题。新增本在各种书目著录中均录为“明抄本”,但尚未完全反映出它的面貌来。它是严格按照刊刻本的规制抄写的,四周文武栏,双鱼尾,黑口,半页九行,行十八字,第一页题为“新彫校正青琐高议”,后边每卷又杂用“校正新增青琐高议”、“新增京本青琐高议”与“校正重增青琐高议”等名目。更重要的是,在正文第一页第二行低四字有这样一段话(“□”代表原缺一字):

①参见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597页;《四部精要》第十一册《通志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814页;《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69页。

②分别参见《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099、4201页;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年第1315页;《云麓漫钞》,中华书局,1996年,第38页;《苏轼诗集合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720页。

③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之编年在万历末附言“某氏刊宋刘斧所撰《青琐高议》十八卷”,实为袭自书目者(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780页)。

④鲁迅疑此别集即为刘斧的另一小说集《青琐摭遗》(鲁迅辑《唐宋传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11页),实非,参见李剑国《宋代志怪传奇小说叙录·青琐摭遗》第199-202页。

本家昨刊此书已盛行于世,惟恐旧本文理讹舛,览者详焉。今得名公重加校正,并无一字差误,增广诗词□□□百余事,作前后别集,侵木以刊行传续□□□,伏幸详鉴。

从这段珍贵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知道,这家书坊在此前还曾刊刻过未经“增广”的《青琐高议》(此本已不存),这次不但“重加校正”,而且还“增广诗词□□□百余事”;更重要的消息是“作前后别集”五字,可见《青琐高议》之分为前后别三集的大致面貌是从新增本开始的。从新增本所存前后二集的目录来看,与今传的所有本子均大致相同,因此可以肯定,现存的本子均或直接或间接出自本书。

首先,新增本首次将《青琐高议》重编为前后别三集。现存为前后别三集的本子当然出自此本。而且据李剑国先生考证,今本的后集与别集中均杂有原本前集的条目,所以新增本的面貌已与原本不相同了,但是现存的所有本子,也包括那些仅有前后集或仅存前集的本子,其分卷和篇目与新增本没有什么不同。其次,新增本注明了许多新增篇目。前集在目录中注明者有卷一的《明政》、《许真君》,卷二的《书仙传》,卷三的《寇莱公》、《李诞女》和《郑路女》,卷六的《贵妃袜事》与《马嵬行》。正文中《许真君》、《书仙传》、《李诞女》和《郑路女》四篇题下亦再次注出“新增”字样,而且目录中未注的《颜鲁公》在正文中也注有“新增”字样。而后集卷二共十六篇,只有《司马温公》一篇无新增字样^①,余十五篇中,《李侍读》与《范文正》二篇目录中无而正文中有,《王荆公·不以军将妻为妾》与《张文定》两条正文中无而目录中有。又目录中卷六的《刘焯》与正文中卷七的《温琬》均注“新增”或“新入”。而与《温琬》一条之隔的《甘棠遗事后序》篇实即《温琬》的一部分,所以也当是新增的篇目,由此不但可见其重编之迹,而且也可以知道,在没有注明的篇目里,也还会有新增者。又新增本佚去了别集,但通过前边那段文字知道它是有别集的,而现存所有版本的别集卷四《张浩》与《王榭》两篇均注有“新增”字样,这也是除此新增本与另一明抄本惠栋藏本外其余所有现存版本中唯一留下的“新增”字样。所以可知别集也当有一部分为新增篇目。

有了这些“新增”的线索,我们便可以大致理一下重编的有关问题了。前文说过,宋代有大量典籍徵引了《青琐高议》的篇目,笔者详细地查阅了这些篇目,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这些徵引几乎没有出自新增者。《诗话总龟》前集中注出和没注出的引自《青琐高议》者共四十六篇,除十六篇今佚者外^②,无一与新增者相同。其卷四十八有《王榭》一篇,即《青琐高议》别集卷四之注明

①这一卷中的十六篇全是小短章,形制基本相同,所以仅此一篇无新增字样颇值得怀疑。加之下文提及其此有彼无的情形,此似当为漏注者。前文提及不可作为推测成书下限之论据者均属此类。

②此十六篇程毅中先生辑出十二篇,李剑国先生又续辑四篇。

新增者,但所注出处为刘斧的另一小说集《摭遗》^①,且据《能改斋漫录》卷四、《绀珠集》卷十二、《类说》卷三十四和蔡梦弼《草堂诗笺》卷二引严有翼《艺苑雌黄》^②所云,此篇确出《摭遗》无疑。《绀珠集》卷十一引十九条、《分门古今类事》引二十条亦均无与新增相同者^③。《绿窗新话》与《青琐高议》相同者为十三篇,只有一篇与新增者相同,但恰恰这篇《任生娶天上书仙》的出处并非《青琐高议》,而是注出《丽情集》^④,由此一篇不但可以证明重编之迹,而且还可见其重编时的新增篇目之来源^⑤。当然,查了这么多资料,仅有一条不利证据,曾慥在《类说》卷四十六收录了《青琐高议》四十八条,《续青琐高议》八条^⑥,共五十六条中,只有一条《分财不平》正是注明新增中的《明政》篇。由于其他资料均无相同者,只此一篇,故其新增字样颇令人怀疑,或可能是误注。

新增本里的所有新增篇目在现存的所有版本中均同,这便是其为这些版本源头的原因。还可以再补充一些。后集卷一目录中标为《方勉·李主遣鬼取名画》的一条,在正文中实际上是“狄方”。之后的版本无一例外存在着这种差别。目录作“方勉”并非空穴来风,在《诗话总龟》前集卷十九恰有“方勉”一条,其出处注云“同前”,明月窗道人刊本《诗话总龟》此条前为《古今诗话》之条目,而明抄本此前则为《青琐高议》之文^⑦,更重要的是《竹庄诗话》卷二十二亦有此条,恰为引自《青琐集》者^⑧,由此可知《方勉》应该就是《青琐高议》中之一篇,抄写者或因“狄方”之“方”与“方勉”之“方”同而把它抄漏

①(明)阮阅:《诗话总龟》,《笔记小说大观》(台湾新兴书局,1977年,第916页)第三十八编影印明嘉靖月窗道人本。

②参见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73页。

③《绀珠集》本有一条为佚文,由李剑国辑出。而《分门古今类事》二十条中,仅六条为今本所有(《笔记小说大观》(台湾新兴书局,1977年第994、995、1025、1119、1459、1592页)第十九编影印《十万卷楼丛书》本《新编分门古今类事》)余者均为佚文:程毅中先生辑出十三条(其《查道侍从》条因在两条注出此书之间,又未注出处,故疑亦出此书,实四库全书本《分门古今类事》中,此处出处即赫然为“青琐高议”),李剑国先生续辑一条。

④参见皇都风月主人编:《绿窗新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6页。

⑤新增篇目中,除上面的《王榭》出自《摭遗》外,《寇莱公》条(据《增广分门类林杂说》卷十三所引)、《李太白》条(据《类说》卷三十四)及《崔先生》条(据《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七)亦均出自《摭遗》。李剑国先生认为此几篇为“误取”,其实不过是新增者阑入而已。又如《韩魏公》条,据《类说》卷五二、《厚德录》卷二所引,当出自刘斧另一书《翰府名谈》,李剑国先生以此认为“偶有一事而载于二书的情况,当是出于作者的疏忽”,实际上此篇亦为后人据《翰府名谈》增入者。

⑥(宋)曾慥编:《类说》,《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六十二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777-793页。

⑦参见月窗道人本《诗话总龟》第432页。按:此本后人有据明抄本补入此则者,参见同书第441页。

⑧(宋)何汶:《竹庄诗话》,中华书局,1984年,第424页。

了。后来的本子如董康诵芬室本及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都是据正文改动了目录,却不知道这里还隐藏着另一篇小说。

三、其他明抄本

《青琐高议》的明代抄本除新增本外还有一些,其中,沈与文的抄本应当是最早的,只可惜它已经佚失。幸而近人董康据清代黄丕烈的士礼居本刊刻的诵芬室本保存了它的痕迹:其后集卷五末尾有“弘治乙丑岁腊月二十四竹野山斋谨录”的字样,后集卷十后又有“明嘉靖元年正月上元日阊门外萧安装于太平桥之南垞,沈文辨之记”字样。这两段文字似乎并不出自士礼居本,因为士礼居本的忠实抄本红药山房本无此文字,极有可能是董康从王士禛藏本中录来(详后文)。这里的“竹野山斋”当为“野竹斋”之误,而“沈文”当为“沈与文”,因明代喜欢抄古籍的藏书家沈与文别号辨之,斋名为“野竹斋”^①。所以,现在凡有此字样的版本都当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吴郡沈氏抄本。不过沈氏抄写此本似乎很艰难,因为后集卷五是1506年抄成的,而卷十后之记载却表明其后集的最后抄成已在嘉靖元年,即1522年,前后竟然持续了十六年。

与沈与文抄本抄成年代大致相同的正德年间还有一个抄本,即《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著录为清人陈宝晋跋的明抄本。笔者细检此本,书前衬页上有手跋一通,末署“守吾识”,则“陈宝晋”与“陈守吾”实为一人^②。张友鹤先生在校注《唐宋传奇集》时用过一个惠栋藏本来校勘,实即此本。此本钤“惠定宇手定本”、“惠栋之印”、“字曰定宇”、“石莲阁所藏书”、“曾在赵元方家”、“赵钊珍藏”、“赵氏元方”等印记。可见在惠栋后,此书又历吴重熹(吴氏号石莲,其书斋为石莲阁)与赵元方两家,终归北京图书馆。此书最后一页上有“正德十二年仲冬十三日录”字样,所以黄丕烈称其有“正德年间钞录字”,李剑国亦云此本“乃正德十二年(1517)抄本”。

此抄本应当是现存各本中最接近新增本面貌的本子,因为其他所有的本子都只在别集卷四保存了两个“新增”字样,而惠栋藏本却在前集之《明政》、《许真君》、《寇莱公》、《李诞女》、《贵妃袜事》与《马嵬行》六篇题下保存了“新增”字样,只比新增本少标了三篇。从此也可以看出,惠栋藏本是一个从新增本到后来通常所见其他版本的过渡型的版本。

①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中华书局,1981年,第149页。

②李剑国即疑此二人是否为同一人。南京图书馆所藏元杨朝英辑《阳春白雪》一书中分别有“陈宝晋印”、“陈宝晋经眼记”及“守吾鉴赏”、“守吾平生珍赏”的印,还有一方“陈宝晋守吾口记”的印章(参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73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45-473页),据此即可证之。且据国图所藏此本陈氏跋语云“此书系惠定宇家所藏”可知其为清人无疑。另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一书(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905页,)录陈守吾《不求安居吟草》入“生于咸丰”年间者。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仅存前集十卷的明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排印本《青琐高议》之出版说明称其书“伪误颇多,且仅有前集”。经笔者细检,此书曾经清代沈德寿收藏,前有“双泉草堂珍藏”、“吴兴抱经楼藏”、“浙东沈德寿家藏之印”、“抱经楼藏书印”等印章,书本阔大,抄工很好。其前集篇目与新编本同,新编本之版本特征如“方勉”条与“寇莱公”条此本亦同,可知其亦出自新编本,但此本没有新增字样,亦可知在抄录过程中有所变化,而且果然“伪误颇多”,臆改之处随手可见。

四、万历年间张梦锡刻本

不过新增本还不能完全笼罩后世所有的版本,它所据的宋本便已有了阙文,这有很多的例子,如前集卷三《寇莱公》条,其标目中阙一“竹”字,且有目无文;同卷《高言·杀友人走窜诸国》篇,阙“窜诸国”三字;目录卷七《孙氏记·周生切脉娶孙氏》篇阙“脉”字;后集卷五《隋炀帝海山记》“构亭殿,曲屈□□□□间华丽”,中亦阙四字(此例详下)。而后世却有本子赫然不阙,可见当另有所据,其所据即明万历乙未(1595)张梦锡刻本。

邵章在为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做续录时,即著录了“明万历刊本”^①,鲁迅先生校录《唐宋传奇集》时也用过此本,钱南扬在校录《宋元戏文辑佚》的引用书目中列了它,但此后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出版说明、李剑国叙录等均云此本未见,而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录,此本还残存前集卷一至卷二、卷六至卷九,收藏在辽宁省图书馆。虽然它仅存前集的几卷,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称之为二十七卷本,欧阳健亦如此著录,恐不确。据鲁迅先生《稗边小缀》言,“明张梦锡刊本,前后集各十卷,颇难得。近董康诵芬室校刊士礼居写本,亦二十卷,又有别集七卷”^②,似乎鲁迅先生所见的张梦锡刻本为二十卷本,而此本的著录为何在仅存前集七卷的情况下成为了“二十七卷本”,这颇值得怀疑。

笔者翻检了此书,全书正文首页署名为“元刘斧著 明张梦锡校”,目录首页前有“棟亭曹氏藏书”、“长白敷槎氏菴斋昌龄图书印”、“平妖堂”、“满洲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书印”等印章,可知此书先经曹寅收藏,后归其外甥富察昌龄,继而被马廉收藏,最后流入伪满洲国图书馆。

此本虽不全,但却存有书前总目,因此可知并非二十七卷,而是二十卷^③,虽然没有别集,但篇目与顺序均与新增本前后集无异,故知当从新增本出(不过,其“新增”字样已经全部删除了)。然而,亦有值得讨论的不同,最为

①(清)邵懿辰撰、邵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607页。

②鲁迅辑《唐宋传奇集》第411页。

③其实,此书在台北中央图书馆尚存全帙,著录云“二十卷”,可知其为二十卷无误矣。

鲜明的,是别的本子全都分前后集,每集十卷,而此本不分前后集,二十卷是连排的^①;而且,上文刚刚说过新增本的一些阙文在此本中却不阙。《隋炀帝海山记》一文,新增本“构亭殿,曲屈□□□□间华丽”句中有阙文,新增者在此留了四个空格^②,而下文要说的惠栋藏本或许参考到了抄录更严谨的本子,所以在此留了十个空格,黄丕烈士礼居写本则据那个“前明朝钞本”的朱笔校记校补了六字,作“构亭殿,曲屈盘旋,广袤数千间,华丽”,董氏诵芬室本亦照录,但仍嫌不通。此本当然已无此篇,但据张梦锡刻本校录的鲁迅《唐宋传奇集》本此处却作“构亭殿,曲屈盘旋广袤数千间,皆穷极人间华丽”,则文通义顺。即此可见,新增系统的本子或者因有两个“间”字而漏抄了数字,直到后来的国图清抄本嫌“构亭殿曲屈间华丽”不通,干脆把这个“间”字也删去了。从这一点可见,张本确当据新增本系统外的某一本校过。

五、明清之际的项药师藏本与王士禛藏本

现存《青琐高议》的几个清代本子前均有署为“丁亥项药师”的题记。项药师为藏书家,传世的一些古籍上有其藏书印,一些书目题跋及笔记也提及他,但其生平年里却无法考实。据其“携李项药师”与“万卷堂”的藏书印可知,其当为浙江嘉兴藏书世家项氏族人,近人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卷六中其至说“药师名德新,嘉兴人,元汴子”^③。据同时而稍后之姜绍书载:“乙酉岁,大兵至嘉禾,项氏累世之藏,尽为千夫长汪六水所掠,荡然无遗。”^④此“乙酉岁”即指顺治二年(1645)清兵攻入嘉兴,据此,则“丁亥项药师”的题记就不可能是顺治丁亥(四年),而当是万历丁亥(十五年)。也就是说,曾经有过一

①此与鲁迅先生所说亦有微异,然或当为先生受通行本分前后集之影响而误书者,因为就台湾所藏之全本而言,亦当为连排者,因其著录即云“二十卷”,而其馆所存另两种《青琐高议》则均记为“前集十卷,后集十卷,别集七卷”,可知若此亦分前后集的话,其著录也会反映出来。

②或是因为要付刻的原因,新增者极为珍惜版面,经常性地合并文字行,以节省篇幅。

③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441页。又,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第373页)云“项药师,项靖字,德新之孙”,言之确凿。未知何者为是。然项靖若为德新之孙,则其当与朱彝尊、钱曾、季振宜、王士禛大致同龄(德新生于1558至1562年之间,卒于1623年,而朱彝尊等人均生于1630年前后),顺治二年时刚二十余岁,而其家庭藏书刚刚“荡然无遗”两年,且据《居易录》卷十五与十六载,他的《周昙咏史诗》与《学古编》写本还流入王士禛手中;据《读书敏求记》卷三载,其所刊行《研北杂志》的原本亦流入钱曾手中;再据彭元瑞《知圣道斋读书跋》卷二可知,季振宜藏有“从项药师、朱锡鬯旧抄本录得”之《周昙咏史诗》,亦可知似非同时代人。而余绍宋曾为浙江通志馆馆长,主持编修《浙江通志》,且早年所修《龙游县志》亦深受梁启超之推赏,当娴于浙江之史志谱牒,所云当必有据,故暂从余说。

④姜绍书:《韵石斋笔谈》,《笔记小说大观》第14册,江苏广陵刻印社,1994年,第156页。

个项药师收藏的明本,这个本子绝非张梦锡刻本,因为项靖写题记的时间比张氏刻本还要早八年,所以,这极可能是一个抄本。书虽已佚,其面貌与渊源在王士禛藏本中却可大体推知。

王士禛曾为《青琐高议》写过一跋,黄丕烈有按语云“此跋乃松崖惠先生所录,余审其笔迹,乃渠少年时所书”^①。而据《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邵懿辰记载,“振绮堂有渔洋山人所藏钞本”^②,可知曾存世一个王士禛藏本,且据黄丕烈按语提供的线索可以推断,惠栋曾看到过这个王士禛藏本,而且还抄录了王写在此本上的跋。那么,这个王氏藏本是否还存于世呢,笔者认为,上海图书馆所藏清钞本《青琐高议》^③就是王氏藏本。

此书封面有“四库未收书”与“巴陵方氏珍藏”印,衬纸下有“慎流传勿损坏”印,前有“蒋维基字子屋号曰子轩”印,目录首面有“蒋祖诒”与“穀孙”印,正文前有“子屋”与“蒋维基印”,首页有“三原图书馆”印,书中夹条上端写“于右任”三字。而在全书总目之后有两行硃笔识语,云:“此《剪灯新话》之前茅也,似此俚鄙而能传于后世,事固有不可解者。阮亭书于京邸匏墨斋。”此识语笔迹与抄本笔迹不同,且全书每页A面上端均记录本页抄录字数,总目末页录本页字数为97字、总目录882字,均不计识语字数在内,方功惠在跋语中亦认定此“为渔洋山人手笔,尤不易得”。以此上数端可大体推论此书的沿递:书当于明清之际抄自项药师藏本(或项药师藏本之过录本),并为王氏所藏;王氏死后书籍散出,辗转归于同邑汪氏振绮堂,汪氏藏书数世,终不能守,此书被蒋维基获得;蒋维基曾对此书进行了校勘,现在的四册书后均有校毕之日期,约在道光己酉(1849)四月;其后此书为方功惠所得,方氏在书前抄录了《宋史艺文志》、晁志、绛云楼、述古堂、士礼居等书目记载,并为作详跋;方氏死后,此书散出,曾归蒋维基之孙蒋祖诒;现书中有三原图书馆的印章,书内又有写“于右任”三字的夹条,未知是否曾经于氏收藏。

此本后集即有关于沈与文的两条文字,可知此本当与沈与文抄本有关系。

此本首次在孙副枢序后多了“丁亥项药师记”的小序,中国国家图书馆亦藏有一种清钞本,大体与此本同,而此后的本子凡带此识语者,皆自此袭来。此二本亦有个别特殊的异文,如《隋炀帝海山记下》陈后主诗“水殿不复反,龙舟兴已遐”,几乎所有版本皆同,唯此本“兴已遐”三字作“成火霞”(惠栋藏本与士礼居本均做“成少霞”,显然是“成火霞”之误),而《诗话总龟》卷四九之

①后人为王士禛所辑《渔洋读书记》之类的书均失收此跋,黄氏按语亦未收入《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中,而见于红药山房抄本《青琐高议》全书之末。

②(清)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607页。

③其书以此为校本,但却似去取随意,并未全校。

引文正作“成火霞”^①。其抄者据《诗话总龟》作校改的可能性不大,当别有版本依据。

六 清代士礼居本及董康诵芬室本

清代藏书家黄丕烈的士礼居写本经黄氏精抄并与所能见到的版本做了校改,所以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版本,但正因如此,其成分亦较复杂。就其总体面貌而言,则抄自张绍仁(切庵)^②藏抄本。据黄氏《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六^③云:

此前集,钞胥至今春始完。适养疴内室西厢,手校其误。内有原本误而钞胥已据文义改正,辄用朱笔识于旁,以存其旧。甲戌闰月复翁。

是书后集先钞成,因手校一过,中多空白,或系原来缺文,或系剜去有字处,或系墨涂难辨处,聊存此梗概已耳。癸酉除夕前二日校讫,复翁记。

甲戌孟夏,友人收得《青琐高议》下册,乃后集十卷完具者。先以书名告余,余曰:“为何时钞本?”友人云:“楮墨古拙,是为前明朝钞。”因遣足取之,手校于临写张切庵本上,实有胜是者;且疑张藏钞本亦出自前明朝钞本,特传录时,文多一番脱误校改耳。书以最先者为佳,信然。复翁。

由此可知,士礼居写本后集抄成于嘉庆十八年除夕前二日,而前集则抄成于嘉庆十九(1814)年闰二月。亦可知,前后集原本都是抄自张绍仁藏抄本。据后集跋,黄氏在嘉庆十九年夏又得到了一个仅有后集的明抄本,他还依此本在已抄好的后集上做了些手校工作。由于此本现存日本岩崎氏静嘉堂文库,笔者未能亲验,不过南京图书馆藏有清红药山房抄本,这是丁丙八千卷楼藏书,前有丁丙跋,即云“抄黄尧圃藏本”,而且这个抄本抄得极为忠实。《皕宋楼藏书志》卷六十三录有士礼居本的孙副枢序,与红药山房本对照,后者仅多出一“而”字,而此二本事实上与其他各本均有数处异文;黄丕烈为其书后集所题之跋语中曾说:“所收旧钞本复校至再,可云精审。向有朱墨两笔校字,兹悉标记。其不标记者,皆旧钞本字,而非由校改也。”红药山房本亦将黄氏校字照抄(抄录者还标明了“朱笔”与“墨笔”的分别),所以,这个本子从某种程度上可代表黄氏士礼居本:这个本子别集没有一笔校改,前集只几处改抄误的校笔,而后集十卷里^④,共有114处朱墨笔的校改,且都以所谓的“旧钞本”为依据,可见这个珍贵的“前明朝钞本”与通行本颇有歧异。

①(清)阮阅:《诗话总龟》,《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十八编,(台湾新兴书局,1977年)第929页。

②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中华书局,1981年,第180页。

③所引其关于《青琐高议》之题跋均见于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续修四库全书》第923册影印光绪滂喜斋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76页。

④此本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著录为“存二十六卷,后集缺卷十”(子部第739页),而事实上,在齐鲁书社影印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46册中,即收有此书的影印本,笔者细检,并不缺,未知何故。

除此之外,士礼居写本的别集还当来自另一个版本。在其别集卷七后亦有黄氏之跋云:

说部旧本难得,即如《青琐高议》,世鲜传者。客岁玄妙观前冷摊获此蓝格绵纸旧钞本。卷尾有正德年间钞录字,且为松崖惠先生藏本。惜已归友人处,遂借归分手录之。此别集乃又一人钞也。复翁。

因此可以推知,士礼居写本的别集当是抄自惠栋藏本。

此外,还可以推测,惠栋藏本与士礼居写本的底本当有一定的关系。在黄氏给后集写的题跋中,还有一则云:“此本虽止后集一种,然所获良多,不仅在补阙数条也。”可见黄氏所据的张绍仁本后集当有“数条”阙文,黄氏据“前明朝钞本”作了增补。而惠栋藏本与上文所说的两个清抄本都有相同的阙文:即卷二《李侍读》半条与《范文正》、《直笔》、《王荆公》三条;卷十《中明子》半条与《施先生》、《马大夫传》两条。这几条阙文在士礼居写本的忠实代表红药山房抄本中却并不阙,可见黄氏所云之补阙,当为补此数条。由此可见,惠栋藏本或惠栋藏本的底本与张绍仁本或其底本应当有一定的关系:他们都佚去了上述的几条文字,而士礼居写本却又据那个“前明朝钞本”把阙文补上了。

此后的版本源流就简单了,董氏诵芬室本是据士礼居写本校刊的,当然,他还收录了项药师的题记及与沈与文有关的两段文字,这都是王士禛藏本的特征,或者,他也根据王士禛藏本做了一些校补工作。此外,从阙文的补录与一些异文的校改情况看,他还是花了很大力气,所以能成为一个通行的本子。而鲁迅先生校录《唐宋传奇集》时先用张梦锡刻本校录了《隋炀帝海山记》,并校以董氏诵芬室本,而其另外五篇则直接录自董氏诵芬室本^①。1958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据董康诵芬室本排印出版,并据王士禛藏本做了一些校订,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古典文学版再版,并增补了程毅中先生所辑的三十六则佚文,成为此书的较佳之本,然其书底本选择并不切当,且取校未广,颇有疏漏。此后,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1年将此书原样收入《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笔者撰写此文后,又获见2006年大象出版社出版《全宋笔记》,其第二辑中收入此书,所选底本优于上古本,但对于最为重要的两个版本却未取校,亦未广辑佚文(李剑国叙录已辑得十四条,此外尚有可辑者),仍只以程毅中先生所辑入附录,实为可惜,而且全书亦颇有疏误^②。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参见鲁迅辑:《唐宋传奇集》第408、411页。

②暂且不论其点校中的疏误(如原序有校三条,却几乎全错),就版本问题而言亦多错漏:如其所用底本,即清人陈宝晋跋的惠栋藏本,而整理者误为“明陈宝晋跋钞本”;其校本红药山房本实为抄自士礼居本者,亦误以为“基本照录明陈宝晋作跋的钞本”;将另一校本董康诵芬室本简称为“士礼居本”也不妥当,因为董氏虽据黄氏之本刊刻,但已有大量校改;又误解文献记载,把“万历刻本”当成与张梦锡刻本有别的另一种明代的刻本。